

特尼扬诺夫 著

公使之死

Gongshizhisi

朱志顺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公使之死

[俄] 特尼扬诺夫 著

朱志顺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使之死/(俄罗斯)特尼扬诺夫著;朱志顺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5

ISBN 7-5382-5997-X

I. 公… II. ①特… ②朱… III. 传记文学-俄罗斯-近代
IV. I5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9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439 千字 印张:20 1/4

印数:1—3 000 册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胡大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 江

定价:40.00 元

“您描写的格里鲍耶陀夫令人信服”

——译者前言

俄罗斯文艺学家、作家尤里·特尼扬诺夫(1894—1943)一生著作颇丰,他在翻译、教学和编辑之余写了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和短篇小说,而对为大诗人撰写历史传记小说情有独钟。他先后创作了描写十二月党人诗人丘赫别凯的《丘赫利亚》(1925),塑造著名的《聪明误》(即《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的艺术形象的《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1928,中译名书名改译为《公使之死》),以诗人普希金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普希金》(1935—1943,未完成)。

第一部历史传记小说《丘赫利亚》一问世就获得批评界和读者的一致肯定,而且此后一直得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赞赏。可是第二部历史传记小说《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面世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对于《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赞同者有之,否定者亦大有人在,可谓毁誉参半,争论不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小说不断引起争论,有时甚至十分激烈,其中原因异常复杂,难以说清道明。时至今日,要想比较全面、公正、深刻地分析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连续不断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论的

原因,而且要让人信服,仍然是较困难的。但是,作为这部作品的译者,我依然想谈谈自己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首先,《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的主人公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在俄国和苏联一向得到毋庸置疑的肯定的格里鲍耶陀夫。作为一位作家,他仅以一部剧本《聪明误》即可跻身于普希金、克雷洛夫等大作家的行列。他的《聪明误》在1823年即已完成,但沙皇的书刊检查机关一直不准其出版、发行和上演。他曾为这部心血之作不能出版和上演而痛心疾首,抱憾终生,可是《聪明误》的手抄本到1831年为止,据说已达一万五千多本。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如无社会和环境的干扰,如不是在1829年二月殉职于德黑兰,他本可以写出更多的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作品。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作过这样的论断。事实上,格里鲍耶陀夫在繁忙的外交谈判期间已在构思和写作另一部以外高加索为背景的悲剧。

格里鲍耶陀夫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改革家和外交家。他针对外高加索当时的社会状况、民族构成、地理气候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对当时美国、印度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了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格鲁吉亚改革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在《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中并未展开细述,但从作品中有关这个方案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相对独立、松散联邦的设想。这种设想对于外高加索的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和与俄罗斯腹地的关系无疑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俄国和俄罗斯人民也将从这种改革中得到直接的利益。无奈他的方案不被尼古拉一世和政要们赏识,甚至连昔日志同道合

的十二月党人、后来担任俄土战争实际指挥者的操有实权的“变形人”布尔佐夫也拒绝接受他的方案。不过,可以设想,后来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人民是赞同这个方案的。

作为一名称职的外交官,格里鲍耶陀夫参与了 1827 年至 1828 年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各种外交活动,对于 1828 年 2 月俄国与波斯签订土库曼彻和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费一兵一卒,在谈判中以自己出色的外交才能为俄国赢得了大片领土和至少一千五百万银卢布的赔款。在明知有生命之虞的第二次出使期间,他凭借自己的机敏和智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英国的外交企图,同时迫使波斯部分履行了土库曼彻条约,而且在波斯国王费特赫·阿里沙赫面前为俄国再度争得了英法等所有国家所未曾得到过的殊荣与尊严。在格里鲍耶陀夫殉职之后这一百多年中,俄罗斯民族对于他在外交上取得的功绩无疑是不会忘怀的。

格里鲍耶陀夫是一位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曾于 1825 年去基辅与南方协会的成员会面。他的《聪明误》在客观上起了某种革命号召书的作用。他与十二月党人交往频繁,虽然他未亲临 1825 年 12 月 14 日在彼得堡参议院广场起义的现场,但因牵涉此案,被捕入狱半年。出狱后,他写过不少怀念被杀十二月党人的诗歌,作过怀念他们的曲子,并且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营救被囚禁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改善他们的处境。尽管他的革命信仰不总是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的,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革命者。

格里鲍耶陀夫短促的一生(只活了三十四岁)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1812 年的拿破仑入侵,1825 年尼古拉一世夺取皇位,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826年的俄国与波斯战争……他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对于这些事件他均有其独特的态度和行动。而这些态度和行动与俄国进步人士和普通平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以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民族英雄式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创作历史传记小说,这本身就具有难度,而要使作品得到众口一致的称赞和肯定则更难想像,何况特尼扬诺夫又不愿落入俗套,不愿沿着历史的河床平静地流淌,总想用自己的作品冲击一下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生活的批评家和读者的习惯观念和欣赏口味多年筑成的高高的堤岸,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歌颂伟大人物的作品,不写英雄人物缺点、“不给英雄人物抹黑”的作品,都有可能得到普遍一致的青睐和激赏。然而,要塑造和刻画一个生动、丰满、真实的格里鲍耶陀夫的艺术形象,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借助自己对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认识和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使用合理的逻辑推理,创作出一个特尼扬诺夫的格里鲍耶陀夫来,这肯定会招来毁誉不一的批评。可是特尼扬诺夫却这样做了。

特尼扬诺夫在这部《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中塑造了一个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浪涛中活动、受到社会嘲弄、有着为国家 and 人民奉献丰硕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感和才能、富有高尚的精神品格、同时又沾染了当时上流社会人物诸多缺陷和弱点、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时时为强烈的痛苦所烧灼的格里鲍耶陀夫的艺术形象。除了他的光辉灿烂的正面形象之外,我们在作品中还看到了侧面和背面的灰暗。

格里鲍耶陀夫痛恨沙皇专制制度,同情和支持十二月党人

起义,对于保罗一世皇帝第三个儿子尼古拉通过阴谋手段夺取帝位、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贬责那些有功的二十年代的军官,显然心怀不满,可是他对于受到尼古拉一世的接见、获得圣安娜勋章和数千金卢布奖金,对于官阶的晋升,仍然抱有感激和得意的心情。皇帝接见之后,他回到旅馆里,这时他仍沉浸在一种不能自己的激动与亢奋之中,情不自禁地与等候在客房中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忙不迭地握手,甚至还忙中出错地当众拥抱了自己的仆人萨什卡。他一厢情愿地将外高加索改革方案的实施寄托在尼古拉一世的身上,企图用狡猾的机智骗取尼古拉一世的支持,这就注定了他要品尝悲剧性的苦果。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他引起了尼古拉一世、外交部长涅谢尔罗德和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的警觉和敌视。而一般读者心目中的格里鲍耶陀夫似乎不该是这样幼稚、迂腐和糊涂的人。

作为一个作家,格里鲍耶陀夫深为自己在俄国文坛上未得到正式承认、自己的作品不能正式出版、剧本不能上演而痛苦,他甚至也清醒地认识到俄国文学受官吏控制,自己所作的努力纯属徒然。对于沙皇的书报检查制度和书报检查官自然也怀着一腔怨恨,然而他仍与臭名昭著的第三厅主管文学事务的官员布尔加林打得火热,成为布尔加林家的常客。诚然,他频繁出入布尔加林家是为了与布尔加林之妻列诺奇卡幽会,但是想通过布尔加林这条捷径争取尽快出版他的《聪明误》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将《聪明误》的手稿托付给布尔加林呢?可见这位像太阳一样光辉的人物身上也有一个黑点。

在《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格里鲍耶陀夫能逃脱十二月党人一案的进一步追究,在仕途上

还比较顺利,靠的是家族、亲友的活动、庇护和提携,其中主要靠山就是任格鲁吉亚总司令的帕斯克维奇将军。这位将军是他母亲侄女叶莉莎的丈夫。格里鲍耶陀夫对这位靠山采取了面前背后截然不同的卑劣的两面派态度。在彼得堡二十年代军官的聚餐会上,当他听到别人盗用帕斯克维奇的名声骗取荣誉地位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愤恨,反而感到高兴和满意;当那些落魄军官用极为下流的笑话肆意污辱贬低帕斯克维奇的时候,他“也和这些军人一起笑着”。他本人也认为帕斯克维奇并无领军作战的才能。可是到了帕斯克维奇面前,或者在给帕斯克维奇写信的时候,他那仿佛出于内心的滔滔不绝的阿谀奉承之词让人听了实在肉麻。特尼扬诺夫通过这样的描写着实在格里鲍耶陀夫光辉灿烂的脸上狠狠地抹了一把黑。可是读者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作为19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的一名六级文官有这样的表现,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在特尼扬诺夫的这部作品中,还有许多细节描写都反映了格里鲍耶陀夫这位出身贵族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对待自小一起长大的仆人萨什卡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老爷态度,他还担心萨什卡真的是其父亲的私生子。萨什卡向哥萨克们夸耀,自己从波斯回莫斯科后就会成为自由人,而格里鲍耶陀夫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自始至终从没打算给萨什卡以自由。这说明格里鲍耶陀夫并非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某些方面还远不及后来的改良主义者托尔斯泰伯爵呢。

又比如,格里鲍耶陀夫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玩世不恭的浪荡汉。他在彼得堡交往的情妇多得连姓氏都记不起来。他从彼得堡去格鲁吉亚的途

中,对生活在沃龙涅什草原上的受人欺凌的乡村少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都不放过。当时他虽然也想到了他所爱的格鲁吉亚少女尼娜(后成了他的妻子),但仍毫不迟疑地占有了玛丽娅。当然,他后来对待岁数小他一半的妻子尼娜的爱情还是忠诚的。

另外,作者对于他与起义失败后精神颓丧的十二月党人恰达耶夫那次见面的描写亦是含义深长的。恰达耶夫此时贫病交迫、穷困潦倒、寄人篱下,临别时毫无顾忌地开口向格里鲍耶陀夫借五十卢布,并说过后马上通过邮局寄还给他,“可是格里鲍耶陀夫没有钱”。分手的时候恰达耶夫仍然很宽容。这样的小事似乎不值得一提,可是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与他后来为了满足情欲而慷慨大方地送礼物给玛丽娅相比,他对待恰达耶夫是不是太吝啬了?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这部作品中的格里鲍耶陀夫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刻,往往是怎样一种态度。是否去波斯,这是一次重大的抉择。就格里鲍耶陀夫本人的意愿来说,他似乎希望留在彼得堡,希望能在文学、戏剧和音乐方面有更大的成就。然而他明白,他只要成为一个作家,不再担任公职,那么他在文学界和官场里立即就会丧失所有朋友,他会同时受到文学界和官场两方面的排斥。格里鲍耶陀夫当然不甘寂寞,他不可能像当时另外一些亦有才华的作家那样安于清贫,甘心默默无闻,宁愿在文学创作的崎岖小路上跋涉攀登。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最后出使波斯并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更多地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至少部分是受金钱和官阶的诱惑。其实书中的格里鲍耶陀夫是很在乎名利地位的,光是出使起程时对驿站提供驿马匹数的多寡的斤斤计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更不要说他还

曾与涅谢尔罗德为在波斯设代办还是设公使而讨价还价。

在俄国驻德黑兰使馆受波斯暴民冲击前夕，他也曾为是否交出波斯国王的重要宦官雅库布及阿拉亚尔汗的两个妻妾而犹豫，他曾有过动摇，也曾想为使使馆太平、为自己的安全和尼娜的未来而交出雅库布。当然，他最终还是毅然庇护了雅库布，决定为捍卫土库曼彻条约的权威而甘愿冒险。他在暴民冲击使馆时，面临生死关头也曾闪过贪生怕死的念头，但他最终仍然义无反顾地奋勇抵抗，直至以身殉职。他死得很悲壮，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英雄。

这就是《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中的格里鲍耶陀夫，这就是特尼扬诺夫的格里鲍耶陀夫。特尼扬诺夫的格里鲍耶陀夫是有缺陷和缺点的英雄，就像太阳有黑子一样。但这是一个具有艺术真实的形象，是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

高尔基在特尼扬诺夫的《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出版后，除了惊叹作者对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能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能用如此熟练的艺术语言描绘这个时代之外，他在给特尼扬诺夫的信中对小说的主人公还作了这样的评判：“这个格里鲍耶陀夫非常出色，尽管他出乎我的意料。您描写的格里鲍耶陀夫令人信服，他原本应该是这样。即使他原本不是这样，那么往后他就是这样。”高尔基对这部作品的肯定是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批评家、作家和读者的意见，这种肯定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意见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乃至四五十年代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相悖的。

我们可以推断，这部作品在苏联引起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在三四十年代的苏联

文学艺术界、甚至在自然科学界,只尊一家,只许一花独放的现象蔚成风气,造神运动已入“佳境”。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柴可夫斯基等等早已成了至善至美的先贤先哲,绝不容许涉及他们的斑点。特尼扬诺夫尽管在作品中充分肯定了主人公的伟大功绩,但是他在作品中艺术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身上的历史局限与不足,这也是不能容忍的。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引起争论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今,这种社会和政治原因在俄罗斯消失之后,对这部作品的激烈争论自然也会趋于平息。

作家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中可以奉行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义,可以表现出这一个或那一个流派的创作特点,可以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手法塑造自己心目中更符合实际的历史人物艺术形象,这种观点现在可以被绝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所接受。所以,现在的文学批评家和读者再不会仅仅根据特尼扬诺夫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离经叛道式的反传统的创作手法来否定这部历史传记小说了。

爱好《聪明误》的读者,爱好俄苏文学的读者,值得耐着性子读一读这部很有特点的历史传记小说。特尼扬诺夫这位在自己的作品中连罗蒙诺索夫的弱点也敢于嘲讽的诚实作家写的这部作品是有价值的。尽管这部作品中存在着很多缺点,有些缺点甚至客观上为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设置了障碍,但这是一部基本成功的作品。他毕竟描写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格里鲍耶陀夫!

笔者将自己在阅读和翻译这部《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过程中的这些纯属个人一时的感想和体会写成这篇前言,其中不

少想法很可能是主观臆断。但是,正像特尼扬诺夫可以塑造特尼扬诺夫的格里鲍耶陀夫一样,作为读者,每一个人对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不休争论的原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更可以对这部作品本身评头论足。这可以说是时代的进步赋予每一个读者的权利。

欢迎读者指正这部作品译文中的错漏,并对前言中的观点提出批评。

译者

1999年8月30日

目 录

“您描写的格里鲍耶陀夫令人信服”

——译者前言

第一章	6
第二章	46
第三章	206
第四章	233
第五章	308
第六章	389
第七章	418
第八章	463
第九章	486
第十章	532
第十一章	556
第十二章	577
第十三章	621

瞧一瞧现已冷漠的面容，
瞧一瞧，他已没有生机；
但往昔激情留下的痕迹
似乎还依稀可辨！
仿佛深渊上空猛烈的闪电，
虽然转瞬已经消失不见，
也听不见原先可怕的雷鸣，
但仍然残留着运动的形迹。

——叶夫根尼·巴拉丁斯基

1825年12月，在寒冷异常的广场上，二十年代的人们连同他们跳跃式的步态都不再存在了。时间突然折断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练马场上传来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起义者踩着同伴的遗体奔逃，这是对时间的拷问，是一个“大拷问室”（在彼得一世时期人们都这么说）。

缄默得出奇的人们立即来到这里的广场上，这些人面颊上像驼鹿肉似的肌肉拉长了，血管随时都要爆裂。血管就是北方地区蔚蓝色天空的宪兵组成的边框，而本肯多夫^①那波罗的海

^① A. X. 本肯多夫(1783—1844)，尼古拉时代最反动的政客之一。自1826年起任宪兵总监、第三厅(秘密警察)厅长。是出生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本书注释，取自各种素材，来源不一注明。——中译者)

东部地区出身的爵爷的缄默则成了彼得堡的天。

这时候,开始用数量和尺度来量度和评判那些东游西逛的父亲,这些父亲被判处死刑或过屈辱的生活。

一位法国旅人偶尔来到彼得堡,对于俄国的国家机构的结构深感震惊,他在文章中称其为“品名目录的帝国”,同时还说是“杰出的品名目录的帝国”。

父亲们微微弯下了腰,儿子们开始微微活动,父亲们开始害怕、敬重和巴结儿子们。每到夜里,他们就自责、啜泣。他们将此称为“良心”和“追念”。

一切皆空。

因为空虚,很少有人能看清像长剑一样来回飘荡的父亲身上涌出的血,很少有人能看清这一世纪的血的位置变动。

儿子们仅仅比父亲们年轻两三岁。他们用奴隶和俘虏的手忙乱地、企求高价地拧紧了本肯多夫的不值钱的机器,开动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三十年代透出了美洲的气息,冒出了东印度的烟雾。

现在刮着两股风:东风和西风。这两股风各自给父亲们带来了盐和死亡,给儿子们带来了金钱。

政治对于父亲们是什么?

“秘密协会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巴黎追寻的是姑娘,在这里我们追逐熊”,十二月党人卢宁^①这样说。

^① M.C. 卢宁(1787—1845),禁卫军中校,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经受囚禁和苦役之后被长期流放,他是十二月党人中惟一企图继续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人。他所著的《对1816年至1826年的俄国秘密协会的看法》成了众所周知的作品。

他并非轻举妄动的人，后来他在西伯利亚用文字明显挖苦讽刺的书信和方案对尼古拉进行了嘲弄；他用芦苇逗弄狗熊，这样做是轻率的。

暴动和女人成了诗歌、甚至日常交谈最富激情的话题。死亡由此而来，由暴动和女人产生。

横死的人突然遭遇死神，就像突然遇到爱情、暴雨。

“他抓住吓得半死的大夫，苦苦恳求他拯救，大喊大叫地央求他：‘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想活，我想活！’”

被尼古拉禁锢在铁罐中的二十年代的统帅叶尔莫洛夫^①就是这样郁郁而终。

那位被他死死扼住的医生晕倒在地上。

后来他俩在三十年代的人群中又相认了。二十年代的人都有一种“共济会的标记”，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眼神，与众不同的讪笑，这种讪笑别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讪笑几乎是孩子气的。

他们听见周围说的都是异样的言语，他们竭力去琢磨诸如“低级宫中侍从”、“租赁”这类词语，可是他们无法理解。他们往往因为不熟悉自己儿子和弟弟的词语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姑娘”或者为了“秘密协会”而死，那还能死得轻松，可是为了“低级宫中侍从”而死，那就要痛苦得多。

二十年代的人现在死得都很痛苦，因为时代已经早已在他们之前死亡了。

在三十年代，他们临死之时已经具有敏锐的嗅觉。他们就

^① A. П. 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曾参与对拿破仑的战争，1816年起任格鲁吉亚总司令。1827年被尼古拉解职退休。